

【中华民俗风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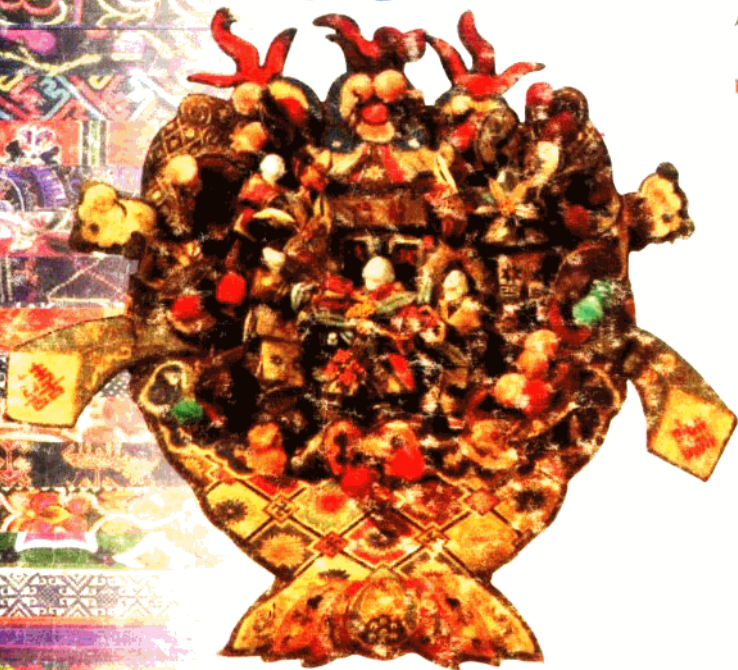
ZHONGHUA MINSU
FENGQING CONGSHU

姚伟钧 余和祥 主编

雷绍锋 张俊超 著



丧葬



习俗

湖北教育出版社

序

冯
天
瑜

言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共有的代代相袭的行为方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它起源于社会众成员不断重复的不自觉行为,因其满足了社会群体的某些基本需要,逐渐变得规范化,被人群广为接受与传承,从而极具稳定性和遗传性。在中华文化系统里,不仅深藏着丰赡的民俗内容,而且素有“观风”、“采风”传统,其内蕴在于朝野有识之士重视民俗的社会功能,力图使之归于雅正,所谓“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刘子》卷九),“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新书·辅佐》)。这正是伦理型的中华文化在雅俗边际处所下的

特别功夫。武汉地区一批中青年学者,承继先贤遗泽,运用新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探幽致远、锐意精进,呈献给读者诸君的这套《中华民俗风情》丛书便是他们研习有年的成果结集。希望这套丛书为读者所喜爱,并在新一轮的民俗细缙化育和归于雅正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

1999年8月14日书于武昌珞珈山麓寓所

目

录

一 未雨綢繆,不可忽也

——葬具/1

(一)预制寿器求长年

——棺槨/2

(二)不在山头在心头

——风水/7

(三)殁殁在前未封树

——营墓/12

二 后事指南,可从可违

——遗嘱/18

(一)父祖遗令当勉就

——嘱托/18

(二)假托君命传圣旨

——矫诏/22

三 依依惜别,体贴入微

——大斂/24

(一)上穷碧落下黄泉

——招魂/24

(二)专候骨肉来送行

——报丧/29

(三)急如星火归家去

——奔丧/33

(四)泪飞顿作倾盆雨

——哭丧/34

(五)传灯照亡拘都鬼

——道场/37

(六)金缕玉衣真华丽

——袭礼/41

(七)丧事虽遽不陵节

——停柩/46

(八)为善逝去有佳名

——谥号/49

四 地下世界,冥间天堂

——阴宅/56

(一)园邑之兴始强秦

——墓陵/56

(二)水中明月卧浮图

——僧塔/63

(三)遗声余价显风华

——碑志/67

五 笙歌鼎沸,鼓乐喧天

——葬礼/77

(一)精挑细选出行时

——卜葬/77

(二)鬼伯一何相催促

——出殡/82

(三)弦弦掩抑声声思

——悼文/87

(四)土埋火焚水中生

——葬法/89

(五)树高千丈叶落根

——归葬/99

(六)陋习恶俗为害深

——冥婚/103

六 示富夸富,超越规矩

——赠赠/108

(一)跟随龙驾入天庭

——人殉/109

(二)炫耀财富竞奢靡

——厚葬/121

(三)一夜暴富梦成真

——盗墓/133

七 循规蹈矩,哀毁骨立

——服阙/143

(一)怒焉如捣心忧伤

——守孝/143

(二)麻苧衣衫鬓发焦

——丧服/156

八 顶礼膜拜,报德崇恩

——扫墓/167

(一)娱乐安神在殡宫

——三虞/167

(二)合家造斋供功德

——祭墓/170

九 夏耨冬烝,祭尽其敬

——怀远/180

(一)审定昭穆谛父子

——宗庙/180

(二)锦官城外柏森森

——祠堂/191

后记/203

一 未雨绸缪，不可忽也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对生命不能长久而必然走向死亡的规律的总结和慨叹。在与死亡进行积极抗争的同时，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家长或亲自筹划、或要求已成年的子女为自己制作棺槨和准备相关的丧葬用品（没有墓地的，也有可能邀请阴阳生选择踏勘），以应不时之需。那些高居上位的君王，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几乎从即位之日起，就会下令有关部门建造陵墓……他们知道，人难免一死，只要属于正常的范围，那就是与婚礼、冠礼等等“红喜事”相对应的“白喜事”，所以毫无忌讳，认真办理，这是丧葬风俗中的一个值得强调

的特点。

(一) 预制寿器求长年

——棺槨

《易·系辞下》说，人死了，用荒野之草包裹好后，埋进土中，不用棺槨，不起坟堆，也不在墓地周围植树种草作为标志，更没有硬性规定守丧的时间，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朴实。据说黄帝认为这不太文明，教给臣民制作的方法，这样，中华民族的死者就正式享用了棺槨。

最早的棺槨，也许为陶质，其形状或为瓮，或为罐。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代，此种葬具都比较流行。

用木头制作的棺槨，商代早期开始盛行。墓室较大的长方形竖穴墓中有棺、有槨（或仅有棺），即便是一般平民的小型土坑墓，也都有棺。值得注意的是，殷商时期的部分棺槨已非白坯，而有人为的颜色。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棺材，体积虽然较大，其表面却被涂抹上了红、黑两种颜色；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墓中的槨，是用木头搭制的，槨壁上刻出了花纹，花纹的凹凸处全都填上了红颜色，在其主要的纹饰点线上还镶嵌着用野猪牙雕成的装饰品。这当是后世油漆、彩绘棺槨的滥觞。

棺是装敛尸体及随葬品的用具，槨是棺外的套棺。套棺不是一般身份、地位的人随便可以使用的。《论语·先进》说，德行极好的颜渊不幸短命，孔子哭得格外伤心，边哭边道：天老爷要我的命啦！天老爷要我的命啦！颜渊的父亲，亦即孔子弟子的颜路特意恳请老师卖掉自己乘坐的车子来替颜渊置办外槨。孔子未答应。他不答应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他的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槨，不管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孔鲤总归是他

的儿子。二是他不能卖掉车子而让自己步行去给颜渊购买外椁，因为他曾经做过大夫之类的官（孔子担任过鲁国的司寇）。由此可见，地位不显赫或没有建功立业的人是不可以使用椁的。

庶民不能用椁，却可以用棺，也就是说，棺的使用对象没有限制。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物都被坚决地强制性地划分出了高低档次。于是，棺的大小、形貌以及制作的材料也随之有了讲究。据考古资料介绍，汉代皇室的棺就有别于官吏的棺，官员的棺又不同于老百姓的棺。天子的棺高而且大，有的竟长达4.29米，宽2.71米；官员的棺，平均长度是2.11米，宽度0.7米。贫无力自葬者和战死沙场的士兵的棺材不叫棺，却称“槨”、“槨”，这类棺材极小，勉强可以装下尸体。

制作棺的材料，最为常见的是木材，有桐、杉、樟、梓、楠、柏、松、杂木等。不是所有的木材都可以制椁作棺的，《庄子·人间世》记载，有个名石的木匠前往齐国，途经曲辕这个地方时，看见了一棵高出山头十几尺之后才在顶部长出枝丫的“栢社树”，其徒弟认为是美木，劝师傅停下脚步瞧一瞧。石却说是不成材的树木，做舟船会沉入水中，做棺材会快速腐烂，做家具、梁柱会遭虫蛀。依此来看，制作棺椁的木材必须耐腐朽，而在前述的木材之中，最符合要求的大概要推楠和樟了。楠、樟为帝王的御用之物，也是赐给公卿大夫们的物品。正因为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致使那些得不到这种赏赐的公卿大夫垂涎三尺，而不惜财力、人力，不远千里万里，从南方的深山老林里“请”到京师的家中。

制棺的材料，还有陶土。如1973年四川乐山斑竹湾出土的五代琉璃三彩陶棺即是。

陶土之外，还有石。197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市郊发掘出了一具北魏的画像石棺。石棺选用的是青灰色的石灰石，由底、左帮右帮、前档后档、盖等六块石板安榫装配而成。

制棺的材料除石之外,还有玉。河北省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绡墓中收藏着镶玉漆棺。棺的内壁镶嵌有 192 块玉板,棺的外壁及棺盖共镶嵌着 26 块玉石。

铁、铜、银、金等金属材料也可以制作棺材,但这类棺材多为袖珍型的,它几乎全是佛教徒们装盛佛舍利的专用品,该种类型的棺材,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中塔内就有遗存。

由以上介绍可知,棺材的表面是可以油漆彩绘的。而油漆彩绘水平最高的实物,是湖北随州擂鼓墩墓出土的曾侯乙双重木棺。所谓双重木棺,就是大棺之中套装着小棺。大棺涂抹着黑色的漆为地,上面还画满了朱、金、黄色的花纹。小棺则以朱色为底,用黄黑色绘描出了龙凤、神兽、怪鸟、窃曲、窗格纹等。棺的头部还画有手持双戈的守护神,其造型十分逼真。大棺小棺的彩绘水平极其高超,甚至不亚于现今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小轿车的喷漆工艺,即使埋于地下两千多年,但出土之后却依然光亮如新、清明似镜,因而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工艺史、美术史、髹漆史的绝好资料。

《后汉书·礼仪志下》说,皇帝的棺槨等葬具是由“东园匠”、“考工令”奏上的。此东园匠为东园的属官。东园,官署名,属少府,主掌陵墓内器物的制造。考工令,即考工室令,亦为少府的属官,主作器械——十分清楚,皇帝丧葬用的所有器物,都是由少府监制作的。《汉书·霍光传》说霍光死时,朝廷赐金钱、衣物、“梓宫”(棺材)、“便房”(帝王、贵族坟墓上供吊祭者休息用的小屋)、“黄肠题凑”(槨)各一具,婢妾的葬具十五具。看来东园匠的负担较重,它除了为皇室服务外,我们推测,有时可能还要为有功的大臣、战死沙场的士兵、贫无以自葬的百姓制作葬具。

官府设有制造棺槨的作坊,民间自然可以效法,因为它是谋求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庄子·人间世》就曾提到宋国有一姓荆的人家,栽种着楸树、柏树、桑树,富商贵人前来求购棺材,荆

家的木匠就砍倒客人选中的大树，锯成板块，加工好后让其运走。这虽说是寓言，但我们认为还是有现实生活作依据的。也就是说，民间的棺材作坊最迟也当出现于战国时代。

正常情况下，子女在其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就要选择吉日给他们制作棺材。因为老人健在，所以不说棺材，而讳称“老房子”或“寿材”、“寿器”。吉日一般居于闰月之中。人们认为，闰是余数，即余日，余数、余日的累积，就形成了闰日或闰月。闰日、闰月做寿材，就可以使老人健康长寿、快乐欢悦，“闰年闰月一百岁”，就是这个意思。在木匠动手做寿材的这天早晨，该户人家高挂红色灯笼，点燃龙凤蜡烛，甚至燃放鞭炮，闹出一派喜庆的景象。子女家人全部集中起来，给老人敬献寿桃、净水（即“甘露水”），叩头礼拜，再焚香化表。仪式之后，设宴，子女向老人和木匠敬“长寿酒”。寿材即将完工之日，家人便邀请所有的亲戚和乡邻聚会，举行“祝寿”活动。提前制作寿器之风俗，早者可在《后汉书·孝崇皇后纪》中发现：“敛以东园画梓寿器”，唐人李贤注释说：用梓木做成棺材，再用漆涂抹。将棺材说成“寿器”，是希望久长。所谓的希望久长，并非是要棺材埋入土中之后永不朽烂，而是渴求这个棺材的主人能够长寿，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指少府所属东园于人死之前预治的棺木。提前造作寿器之风俗，迟者可在宋人的著作中找到，王巩《随手杂录》说：“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寿材。”民间这种预先准备的棺材，往往一年涂抹一层油漆，表示制作还没有完成，追求的是一种吉利。

值得提及的事是安徽徽州地区，青年人正式结婚前的一天，男方请人赴女方家搬运回来的嫁妆中，却公然有着一对大红棺材！奉送给新新娘一对棺材，应该是预治寿材风习的遗存和发展。在启程运往男方家时，这对棺材必须走在搬抬嫁妆队伍的最前面。棺材内装有些麻布、白布，据说是留作将来的子孙们送

终时“披麻戴孝”用的。整个棺材罩盖着用大红绸缎精心绣制彩花的“棺套”。棺材的后面还紧跟扛着红漆木制棺凳的两个人。

将棺材作为嫁妆，预示着新婚的夫妻和睦、亲密、吉利、白头偕老。此种习俗，不知和“棹”有无关联？“棹”是棺槨组合中最里面的一层棺，依郑玄的说法，为最亲近尸体的。《礼记·檀弓上》指出，“君即位而为棹，岁壹漆之”。大意是说，天子初即位，便预作内棺，每年加一次油漆，表示“存不忘亡”，具有警醒、告诫的作用；每逢外出巡游、封禅、祭祀，就用专车装载随行，该专车叫“棹车”。唐玄宗时，才废除这一制度（参见刘肃：《大唐新语·厘革》）。

棺槨根基于鬼神的观念。虽说是盛敛尸体的用具，事实上它却同坟墓一道构成了地下世界的“居所”。如果说坟墓是房屋的话，那么槨则为卧室，棺当是床及卧具。棺槨必须土葬，土葬是最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从此层意义上言，棺槨是侈靡、浪费的一个重要根源。

《礼记·檀弓上》说：丧葬用品，君子认为提前准备可耻。一两天就能做好的，君子是不会在亲人去世之前就准备的。此语正确，也不正确。一两天时间就能制作好的丧葬用品，是可以不提前准备的，因为人死之后，依照习惯和规定，有数天的停丧时间，在该阶段，能够添置不少的丧具。而大件的丧具，如棺槨、坟墓甚至衣衾，却需提前准备了，这就是棺材婉称“寿材”、“寿器”，坟墓讳称“寿陵”、“寿堂”的原因。

预治棺槨，也预治寿衣。而此种预治寿衣之事，民间早已司空见惯。据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风俗辞典》介绍，当父母入知命（50岁）或耳顺（60岁）之年，为子女的就该给他们缝制寿衣了。缝制寿衣也需挑选时日——“五富日”。称谓五富日就是将一年的十二个月分成四组，一、五、九月选亥日、二、六、十月选寅日、三、七、十一月选巳日、四、八、十二月选申日。或者不用五富

日，而用“天恩日”，选天恩日的原则是“四季何日是天恩？甲子乙丑丙寅连，丁卯戊辰兼己卯，庚辰辛巳壬午言”。吉日确定，邀请裁缝进家，也有一套类似于做寿材的礼拜仪式。仪式之中，子女要向父母敬献衣料，衣料多为棉布、麻布，即便有钱的人家，也极少用绸缎。仪式结束，裁剪缝制开始。寿衣做成，酬谢裁缝。以后凡是节日或者喜庆的日子，老人就得认真地穿上它。人们认为，活着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死了也会穿同样的衣服。让老人多穿寿衣，他们就知道自己告别人间时的衣着打扮，所以要常穿。这对老人来说，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展示：子女孝顺，家境昌盛。有些地方，甚至主动地将寿衣出借给村邻的新嫁娘为嫁衣，寿衣被众多的新娘子穿破了，老人却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二）不在山头在心头

——风水

古人迷信，因此也很讲究风水。风水，指相宅、相墓之法，故又称“堪舆”。其重点“研究”的对象，是宅地、坟地周围的地势、地形、风向、水流等等，并据以附会人事的吉凶祸福。我们的祖先在求得生存发展和与自然环境斗争的过程中，掌握了营建房舍时利用日光测定座向（朝向）的方法，使住屋在取暖采光方面，依向阳背阴的原则；在适应气候方面，取避风少风的地方；在挑选地利方面，多为临水靠山，所靠之山，是对着太阳的山坡。人们建造屋舍时，还会延请风水先生（堪舆先生）占视、踏勘。据《尚书·召诰》说：周成王在丰时，打算迁居到洛邑去，委派召公先去勘察宗庙、宫室、朝市的地址。这是“卜宅”最早的例证。后来人们将卜宅的习俗扩大到了相墓。人死，只不过是生活场所的

改变,由阳间转入到了阴间,因在阴间同样需要“吃”、“穿”、“住”、“行”,所以必须解决好“屋舍”问题,也就是说,“屋舍”的位置、周边的地理形势等均需认真考虑,慎重选择,据说,这样死者的魂灵在优雅的环境之中才能得到安宁,获取快乐,就会保佑阳间的子孙后代兴旺发达、荣华富贵;反之,他的家人肯定要遭受灾难,甚至一辈子贫贱穷困。

相墓之术大约兴起于周代。汉时,已是大行。将相墓术专门化并推向高潮的,许是《葬书》。相传《葬书》的作者为晋人郭璞,《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著录,一卷,其真伪难考。后因方技之家的竞相演义,遂增至二十余篇。宋蔡元定删为十二篇,元吴澄再次删裁,定为“内篇”、“外篇”、“杂篇”。主要介绍墓穴的吉凶、葬地风水的选择。该书认为,葬埋死者要驾驭生气,生气乘风就会发散,临水便会止歇。所以必须使生气聚集,而绝不可以让其发散,运行到一定距离之后还应该让它马上停下来。又认为,山是龙的象征,称为龙脉。由于山脉有各种各样的形貌,这些形貌,有的是龙脑,有的是龙尾,有的是分龙,有的是起龙。山也有等级的区别,因而被划定为来龙、祖山、宗山、主山。山与五行相配后,便成了金山、木山、水山、土山、火山。山之下,是地。地又可以归类成福地、吉地、凶地、绝地。水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起着“拦截”的作用。总括而言,最好的风水宝地,即上乘的山、土(地)、水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坟址选中了呈马蹄形的、三面有山环抱,前有流动之水围绕的场地,或者找到了最吉利的一点——风水穴,那么,遗体就有了荫庇,鬼神就会将幸福赐给他活着的后代。

《葬书》是风水说中相墓术的总结。自从有了这部“葬经”,相墓术也就盛行起来。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就奉郭璞做了始祖。撰写《四库全书总目》的馆臣认为,因受“遗体受荫”观点的影响,后世的人们担心祸患的发生,长久的不将棺材葬入土中,

或是经常将灵柩迁往这里那里，此种情况已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讥讽。唐人吕才指出，人的贫贱富贵，同祖先死了葬地是否占据了上等风水，葬时是否挑选到了黄道吉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而决定于言行和道德。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谨慎行事，就可以让后代享受恩泽。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尽干丑事、坏事，他就有可能断子绝孙。这种解释算不上科学，但对破除相墓术的消极影响还是很有作用的。宋人司马光撰《葬论》说，他的祖先十分贫困，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只是到了祖父时代，景况才稍有改变。当其祖父去世之日，家族中的人就要求他们家依照世俗的习惯，延请风水先生相墓。他的哥哥迫于压力，就请来了邻村的一位风水先生。当时风水先生所得酬价是制钱一贯，但他的哥哥却私下与风水先生达成协议，给钱二十贯，条件是必须按他哥哥的心意行事。这位风水先生便依照主人的安排走了一个过场，写下“大吉”两字应付了差使。见到这个结果，族人和不明真相的家人皆大欢喜。这种不讲风水的后果是好还是坏呢？司马光介绍道，如今他哥哥 79 岁，在朝中官居高位（其兄司马旦生于 1006 年，卒于 1087 年，官至太中大夫），本人 66 岁，亦为朝中重要的大臣；家族之中做官的竟有二十三人之多。他还说，前年（即 1082 年）妻子死了，他没有请风水先生，丧事从俭，棺成而敛，圹（墓穴）成而葬，直至如今家中也未出现过不幸的事情。因此他作结论说，想知道葬具多好还是葬具少好，看一看我的祖父；想知道《葬书》是骗人还是骗人，请看一看我的家（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五）。司马光还曾针对相墓之事上书英宗皇帝说，埋葬遗体的地方高一些，挖掘得深一点，不使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水冲毁坟地也就可以了，葬埋的地方本身就没有吉地、凶地的区别。进而郑重指出，国家的兴衰，在于德行的美恶；家族的祸福，更依据于德行的美恶，同葬地没有丝毫的关系，子孙后代也用不着去相墓求福。

部分文人学者对相墓术的否定与批判,没有阻止住此种歪风的蔓延,这是因为相墓术从其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扶持与青睐,得到了统治阶级的看重与推崇,该种肯定与鼓励,尤其是部分人的实际行动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局限性,正义的呼声是不可能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

最高统治者于“风水宝地”的钦慕由来已久。众所周知,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老的,他从即位之日起,就开始营建陵墓。所建之墓不像楚王那样,全部集中在一起,也没有紧挨着父祖的坟墓,而是居于其阴多金、其阳多玉的蓝田山麓,并且使渭水改道曲行,东注北转。这是比较典型的风水观念的产物。其后的帝王们选陵,也无不如此。而最可靠的记载,是明由南京迁都北京之前新的陵址的选择。迁都北京的计划已定,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马上选派礼部尚书和阴阳生赶赴北京,在其附近寻找“吉壤”。据说这行人跑了两年多的时间,找了好几处地方,一是口外的屠家营,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进了屠户家定宰无疑,只是时间问题,犯讳,不能用。一是昌平西南的羊山,却突然发现山后有个村庄叫“狼儿峪”,“猪”旁卧狼,不吉,危险,不可用。一是京西的燕家台,但燕家与皇帝的死称“晏驾”谐音,不好,不能用。一是潭柘寺,虽然风景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发展余地,不广阔,无法用。选地大臣无奈,只好继续工作。最后终于看中了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城北边十公里处的一片空旷之地。该地东、西、北三面群山环抱,连绵耸立,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南面虎山、蟒山相对盘踞,有如天然门户;中间是被洪水冲积而成的一片平地,宽阔广大,土层深厚,很利于子孙的发展。温榆河从西北蜿蜒而来,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是块“风水宝地”。成祖听了汇报,看了图帖,还不放心,又亲自跑去进行了仔细的勘察,最终敲定了本人的陵地,这才满意而归。

皇帝追求风水宝地,朝廷中的官员们也争相效仿,《后汉书·